

18.13

湖南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50

责任 编 辑 张二牧 杨伯熙 魏文洲

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泽东题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为袁吉六老师墓碑题字

# 目 录

贺龙的家世	陈治水	( 1 )
贺龙与白求恩	陈明生	( 9 )
周逸群在桑植	张二牧	( 15 )
斯人教天下英才——回忆先父袁吉六先生	袁 诚	( 23 )
致力民族研究工作的石启贵先生	石建中等	( 26 )
回忆画家张一尊	吴佩君	( 34 )
张一尊老师教我学画	秦明道	( 41 )
从丫头到著名演员的云艳霞	揭伯屏	( 44 )
先父张远久的艺坛生涯	张泽莉	( 47 )
杨味蔬与水冲石砚	杨通义	( 52 )
从事师范教育的彭蟾容老师	覃长林	( 56 )
先祖父膝凤藻	膝建庚	( 62 )
谷梅桥传略	谷忠诚等	( 66 )
伯父王荫南的一生	王国庵	( 69 )
热爱教育的田祚兰	程杰生等	( 72 )
我所知道的陈渠珍	孙锡华	( 75 )
汪之斌轶事	张湘楚	( 85 )
汪之斌印象记	肖翼昌	( 91 )
拔贡廖名缙	张永安	( 95 )
茶洞师范校史	黎昌林等	( 97 )

保靖县田赋制度的演变	魏文渊 (112)
李同发商号的经营史	王本亮 (117)
古阳镇今昔对比	文庭芝 (121)
会馆、寺庙林立的浦市	罗同样 (124)
湘西的几种名茶	杨伯熙 (126)
龙山鸦片危害纪实	田绍文等 (128)
沅古坪农民抗缴鸦片捐	王俞久 (132)
罗万类禁烟毒	刘培富等 (136)
回忆先父罗文杰	罗善达 (141)
我所知道的彭风池	田孝磨 (150)
田义卿的一生	石琅斋 (152)
师兴吾兄弟称雄龙山三十年	傅冠群 (160)
后记	(169)
毛泽东同志为袁吉六老师墓碑题字 (照片)	(插页)
填白：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简介 (8)	悼周逸群烈士诗 (14)
从《史记》看传记写作 (28)	清代的科举考试 (33、168)
更正 (51)	鸦片贸易 (55、61)
鸦片战争 (65)	戊戌变法 (68)
时务学堂 (72)	护国运动简介 (84)
辛亥革命 (94、111)	护法运动始末 (116)
蔡 懈 (123)	马日事变 (127)
芦沟桥事变 (13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35)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县解放时间表 (149)	贺龙同志在桑植县洪家关的旧居 (照片) (封二)
画家张一尊遗作 (照片)	(封三)

# 賀龍的家世

陳治水

賀龍祖籍為湖北省安陸府钟祥縣賀家灣。先人賀從先，明末從軍，後隨部由鄂來湘，清代順治初年，在慈利縣九溪落戶，康熙初年，定居今桑植縣洪家關。故賀氏族人有“安陸三遷來澧水，儒宗百代啟人間”之說。概括地說明了洪家關賀氏的遷徙歷史。

洪家關賀氏以賀從先為第一代，賀云貴為第二代。第三代有五弟兄，分別取名為象、虎、龍、鳳、凰，其中除賀凰絕後外，余則繁衍為今之洪家關賀姓四大房，賀龍是大房賀象的後代。

從第四代起，洪家關賀姓按“大廷良士，文學興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輩。第四代先人叫賀大忠，第五代先人叫賀廷宰、賀廷璧。賀廷宰頗有文才，教過私塾；賀廷璧是清朝咸豐年間反抗官府的義士。賀氏後人為了紀念祖先，曾在賀氏宗祠辦了一所私塾，命名從先學堂。這個學堂除設立祖宗神位外，還陳列有賀廷璧反抗官府用過的寶劍和大刀。

賀廷璧是二房賀虎之後，此人武藝超群，很有反抗精神。一八五五年，太平軍由粵入湘，攻下常德，震動湘西。賀廷璧與當地秀才李晖、廉生谷启虞等積極響應，在洪家關一帶集中數千農民揭竿起義，攻進縣城，吓得縣令閔光弼喬裝出逃，躲入城隍廟內，被起義農民捕獲。閔光弼一身皂隸打扮，狀若篩

襟，跪地乞饶。起义农民将他游街示众，并在他的毡帽上贴一张有趣的字条：“闵光弼，真可笑，顶子不戴戴毡帽，衙门不坐坐城隍庙。”把这个县令弄得威风扫地。后来，辰沅永靖兵备道派来竿军围攻桑植县城，贺廷璧等二十多人被处极刑。临刑时，贺廷璧的妻子刘氏，在刑场上用衣襟接住丈夫的首级，不让人大头落地（古有人头落地乃英雄悲剧之说），体现了起义农民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至今，洪家关一带还传颂着“贺廷璧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的故事。贺龙曾说：“贺廷璧攻城，对后人影响很大。桑植城外八斗溪立有三十六块石碑，其中一块就是贺廷璧的。”贺龙很钦佩这位先人，他在学堂读书时，常常抚摸贺廷璧用过的宝剑和大刀。

贺廷宰是贺龙的曾祖，幼读诗书，屡试不第，乃开馆授徒。为人热心公益，宅旁有一小河，“奔流湍疾，道路为梗”（引自《清武庠生贺公衡山先生墓表》，以下引文未注出处的，均见此文），行人十分不便，贺廷宰首倡修桥（即今洪家关的贺龙桥）。终因工程浩大，“费用不赀，至斥腴亩以偿负”。后来，贺龙祖父“代继其役”，虽“屡筑屡圮”，“形神劳悴”，但终获成功，为世人称颂。

贺龙的祖父叫贺良仕，生于清道光己卯年冬月十三日，歿于光绪末年（笔者按：此处生卒年月以贺良仕墓碑为据，但生年己卯疑为嘉庆己卯年；卒年，原碑文只见光绪年号，未见具体年、月、日）。“少读书不成，转而肄武”，能“驰怒马，挽强弓，意气洋洋，力屈等夷”，是个武秀才。为人“淡泊明志，生平不妄受人请托。亲戚或届之在座，闻其理直则喜，否则拂衣而去，不复干涉。故自少至老考试外，足迹不入城门，亦无一字呈长官”，“食疏安素终其身”。

贺龙的祖母姓罗，生子女四人。女名贺崇姑，即贺龙大姐

贺英丈夫谷吉庭的母亲。长子贺士选，次子贺士造，三子贺士道。

贺氏先人“门第鼎盛，簪缨蝉联”，世为洪家关望族。但自贺龙祖父一辈后，家道中落，仅有一间三柱四棋的小木房（即今之贺龙故居）和少量田地。至贺龙父辈更是一蹶不振，故士选、士造、士道诸昆仲，均以务农或间作手艺为生。

贺士选生一男二女，贺士造生一男三女，贺士道，即贺龙的父亲生两男五女。大女叫贺英，生于一八八六年，比贺龙大十岁，配夫谷吉庭，二女贺戊妹，又名贺五姐，生于一八八七年，配夫肖安应，子名肖庆云，女名肖银银（解放后病故）；三女贺三妹（解放前病故），生于一八八九年，配夫谷青云（南昌起义前，曾在贺龙部下任旅长，一九二七年被反动派杀害）；贺龙排第四，生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九）；四女贺满姑，生于一八九八年，配夫向子辉，生有四子，长子向楚森，次子向楚盛，三子向楚才，四子向楚汉；五女贺绒姑（解放前病故），配夫刘玉阶（曾任红军营长，解放前病故）；次子贺文掌，生于一九〇五年，歿于一九二〇年。

贺龙的父亲贺士道，生于一八六三年，歿于一九二〇年。家境贫寒，仅有两亩多薄田瘠土，以种田、缝衣为生。母亲王金姑，生于一八六四年，歿于一九一七年，原籍湖北鹤峰太平镇，忠厚善良，勤俭一生，是旧中国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嫁到贺家以后，生活困苦，子女过多，体弱多病，生下贺龙的时候，乳汁很少，常常看到贺龙饿得大声啼哭。她常对人说：“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就挨冻受饿。”邻居的一位堂嫂，叫陈桂英，眼看小贺龙饿得可怜，常把自己本来不足的奶汁喂给他吃。老人们常说：“贺常伢（贺龙名文常）象包拯，是靠吃

嫂子的奶水活下来的。”

童年的贺龙，由于家境贫苦，七、八岁还没穿过一条可称为遮体的裤子，没吃过一餐可称为果腹的饭食。有时饿得不行，就跑到给自己喂过奶的嫂子家找饭吃。他的大姐贺英常常喊：“常伢，快回来！嫂嫂家里的饭也不多哇！”饥饿难忍的小贺龙，听到姐姐的喊声，就把端在手里的饭碗放下，转身向自己的屋里跑去。这位好心的堂嫂，又把盛好的饭给他送到家里。这位堂嫂，就是一九二九年秋季在桑植庄耳坪战斗中牺牲的贺桂如同志（时任红军团长）的母亲。贺龙对这位堂嫂十分尊敬，解放不久，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原件在贺龙故居陈列室）。信中写道：

桂英姐：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你的相片，你确实老了，你这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靠辛勤劳动过日子，这正是你的美德。桂如侄儿虽为革命牺牲，但是他的血没有白流而换取了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你是很光荣的。我已写信告桑植县政府证明你是烈属。兹逢楚才回家之便，特函致复，并寄上我的照片一张，仅缺大女儿捷生一人，给你留念。

贺 龙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前后，湖南各地淫雨连绵，洪水成灾，三湘四水，“数百里间，汪洋一片，茫无涯际，死者达三、四万人，浮尸蔽江，被灾者三、四十万人”（《湖南省志》）。桑植境内，也饿殍遍野，哀声盈途，到处是吃大户的饥饿群众。贺士道眼看一家人升不起烟，便带着不满十岁的贺龙进城买“义仓”的平粜米。县衙的钱粮师爷杜某作威作

福，派出一批堂勇，用鞭子抽打买平粜米的群众。贺士道见不平，站出来为大家讲几句公道话，堂勇不但不听，反而用鞭子向他抽来。贺士道不畏强暴，和堂勇对打起来，堂勇人多势众，把贺士道抓进了牢房，关押很久才释放出狱。这件事，在贺龙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官府的种子。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贺龙与当时澧州镇守使王子斌取得联系，要王协助购买一批枪弹。王欲贺龙归附自己，多方刁难，一再拖延。贺龙知其存心不善，乃与父亲贺士道及弟弟贺文掌商定，以他们父子俩为人质，买好枪弹，再作计议。

一九二〇年五月中旬，贺士道父子俩整点六、七副鸦片担子，作为购枪之资，同亲友、客商七十余人直奔澧州。行至竹叶坪三人潭境时，遭谷崇合、柏家厚等匪众一百余人袭击，贺士道中弹负伤，被匪徒砍杀毙命，贺文掌被敌活捉，后在阳奇山被匪徒关在瓶子内活活蒸死。

贺龙的大姐贺英，在湘鄂边界威望很高，人民亲切地称她香姐或香大姐，是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干部。

贺英有勇有谋，作闺女时，即显示了她的组织才能。她在母亲多病、弟妹年幼、父亲经常外出做工的情况下，很早就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她经常天不亮起床，侍奉父母，安排劳动，教育弟妹，家务事做得井井有条。左邻右舍常说：“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在贺龙十一岁那年，她与表兄谷吉庭结婚。从此踏上充满斗争、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谷吉庭又名谷虎，善武术，好交游，曾组织一支打富济贫的农民武装，被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委任为湘西巡防右翼支队司令。一九二二年，即贺龙父亲、弟弟被柏家厚等匪徒惨杀的后两年，陈渠珍为了翦除异己，唆使部下马连长将谷吉庭诱骗杀害。贺英眼看杀父灭弟之仇未报，丈夫又遭毒手，心痛欲裂，

悲愤填膺。后在谷吉庭旧部的拥戴下，她挺身而出，继任“支队司令”，与官府对抗，并发誓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一九二五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贺英随军进驻澧州。一九二六年十月，贺龙远征北伐，贺英奉命与胞妹贺满姑等回桑植组织武装，在湘鄂边一带活动。一九二七年，贺龙在北伐战争中节节胜利，贺英与贺满姑、刘玉阶、向生辉（均为贺龙亲属）等人到了武汉，见到了贺龙。当时武汉轰轰烈烈、蓬勃高涨的革命形势，使贺英受到很大教育。这期间，贺龙对她的影响很大，她认识到过去那种为个人报仇雪恨的个人义气不行，必须投入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才有意义。从此，她下定决心，首先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支持贺龙从事的革命事业。就在那时候，夏斗寅叛变革命，妄图占据武汉，贺英在贺龙部武汉留守处作了许多防守工作。不久，汪精卫也叛变了。贺英照贺龙的嘱咐，携带一批武器，与贺满姑、向生辉、刘玉阶、李青云等人回到了桑植，召集旧部，发展武装。

一九二八年三月，贺龙、周逸群、卢冬生、贺锦斋等带着党的指示经洪湖回到桑植，开辟革命根据地，一到家就得到了贺英的大力支持。贺英将所属部队带到了洪家关。贺龙对贺英说：“大姐，我现在不是国民革命军，也不是中华革命党；已是共产党了。”并向她介绍了前委书记周逸群。贺英激动地说：“我心里多么盼望你们啊！现在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我把这支队伍统统交给你们，就算我第一次献给共产党的一点礼物吧。”周逸群非常感激地说：“好极了！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珍贵的礼物。贺大姐，我代表党向你致谢。”从此，贺英加入了革命队伍。

一九二八年秋，工农革命军受挫，只剩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弹尽粮绝，处境极端困难。贺英亲自带领六十多人，送来一批粮食、棉花、棉布、银元、弹药支援部队。战士们穿上

棉衣后，无不感激。贺英临走时对贺龙说：“部队里有党员、团员，要把队伍好好整顿一下。队伍要伍，不伍不行，带队伍要把大家的心带住。”

一九三三年四月，贺英驻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混入农会当委员的叛徒许黄生，勾结覃福斋，纠集中海青、覃雅丰、覃九如、神兵头子吴大坤等匪部三百余人，密谋偷袭贺英驻地。四月十二日，叛徒许黄生带领匪徒寅夜偷袭，将贺英哨兵唐又青打死。敌人蜂拥上前，贺英手持双枪，抵住大门，英勇奋战，但在掩护伤员和家属后撤时，右脚中弹。营长徐焕然要背她突进，她急躁地说：“不要管我，你们快撤。”快到天亮时，不幸腹部又中一弹，便倒在血泊之中，英勇牺牲。

当时，贺龙的二姐贺五姑亦驻洞长湾，在另一个屋场上同时遭到敌人袭击，也中弹牺牲。

贺英牺牲后，贺龙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地对贺炳炎说：“我大姐遭敌偷袭英勇牺牲了，你带支部队和带点钱去收殓一下，总会有点肉渣渣吧。”

贺满姑比贺龙小两岁。一九二八年五月，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向石门、公安一带出击，贺满姑在桑植、永顺边境活动。

五月下旬的一天，贺满姑回到桑植樟木溪家里，被敌人发觉跟踪。当地恶霸地主肖用生指挥团长防队长肖沛然，带领八十多人枪将贺满姑家包围。贺满姑持枪御敌，机智地突围脱险，后转移到永顺桃子溪贺家台贺魏之家里。满姑的亲友将满姑的三子向楚才、四子向楚汉、女儿向金莲送至贺家台，暂时隐蔽。但驻桑植匪军余团长到处捕捉贺满姑，团长张东轩亦派部属张恒如四处侦探，情况仍然十分险恶。为了摆脱这些鹰犬，贺龙好友王东海将满姑母子送至万灵山黄家台薛绍洛（贺龙外围联络员）家里，薛为迷惑敌人，采取了很多措施，以保满姑母子

的安全。但到六月底，满姑母子的下落不幸又被张恒如探知。一天深夜，张恒如亲率四十多人枪突袭黄家台，包围满姑住地。满姑手持双枪，四面迎敌，后因子弹打尽，敌人蜂拥而入，将满姑母子四人捉住。张恒如如获至宝，即将满姑母子押至县城张东轩、余团长部报功请赏。当时满姑最大的孩子只六岁，最小的只两岁。

满姑母子被匪徒押至县城大恶霸地主郁龙章家里关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敌人要满姑交出贺龙、贺英的下落，交出红军藏的枪支，交出共产党的组织，……贺满姑坚贞不屈，宁死不吐半个字。敌人使用了五次惨绝人寰的酷刑，但每次都落了空。

一九二八年农历八月初六上午，匪首余团长、张东轩、陈策勋这伙衣冠禽兽，将贺满姑押到城外校场坪，一刀一刀地刺死了。

（桑植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简介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活动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边界一带的红军第二军团与第六军团，于贵州东部会师，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统一领导下，十一月迅速恢复和发展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九月，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开始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六军团于十一月撤离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周协文辑自《简明历史辞典》

# 賀龍与白求恩

加拿大湖首大学历史教授 陈明生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加拿大籍华裔教授陈明生先生。

Min-sun chen Lakehead University。陈明生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在桑植县，是陈伯陶先生的次子（参见《陈伯陶事略》一文，载《湘西文史资料》第二辑），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九四七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由美赴加。现任加拿大湖首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本文原稿是英文，一九八四年收到此稿后，由朱晓慧翻译成中文。我们在本文的导言部分略加删节。

在白求恩乘船去香港前，他曾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八日从温哥华写信给他的朋友，对激发他下决心去中国的两本英文书给予赞扬。一本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本是爱格丝·史沫特莱的《红军长征》。在《西行漫记》中，斯诺以五页的篇幅谈到了贺龙。看来，白求恩在去中国之前就已知道贺龙的事迹。再者，在白求恩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到延安之后或在该年五月一日出发去晋察冀边区之前，他对贺龙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他旅行在贺龙部下所管辖的地带。当白求恩和布朗到达山西西北部时，他们不仅访问了驻扎在兴县的一二〇师师部医院，还在岚县呆了几天，这儿是贺龙指挥的一二〇师的指挥

部。这些机会为白求恩与贺龙的相互了解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贺龙、白求恩、布朗三人的合影是摄于岚县，就在白求恩和布朗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出发去五台山前一两天之中。在五台山地区住了两周以后，白求恩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写道：他希望再去访问兴县和岚县的医院。尽管白求恩再没有得到重访兴县和岚县医院的机会，但他的加籍护士琼·爱文却于一九三八年夏季在那儿干了两个月。白求恩与贺龙的合作在另两次军事活动中得到了继续。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时白求恩为王震指挥的三五九旅（一二〇师下属两个旅中的一个旅）提供了一个战地医院。在连续四十个小时中，白求恩与他的中国助手们“不停地工作、动手术七十一次。”由于这些手术是在前线做的，白求恩以“三分之一（如上面提及的七十一例）的手术没受到感染”而创造了战地救护的奇迹。

第二次是白求恩与贺龙于一九三九年春在河北中部的密切合作。一九三九年元月，贺龙率领三五八旅的一部分部队去加强由吕正操领导的根据地。白求恩要求并得到了为贺龙与吕正操的部队建立战地医疗所的许可。白求恩和他的“东方远征医疗服务队”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抵达河北中部，并在那个地区来回救护直到六月下旬。由于贺龙和吕正操的部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白求恩的医疗队也随军周旋达五百英里。正是在河北中部贺龙的部队里，白求恩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也正是在贺龙部队所在地的河北中部的齐惠庄，白求恩把他的医疗队安置在离战斗前线仅七华里的地方，在六十九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中做了一百一十五例手术。一九三九年春季与一二〇师度过的这段前线生活，激起了白求恩在夏季写出他在中国出版的主要著作之一：《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为了适应贺龙部队进

行游击战而长途跋涉的需要，白求恩改善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并把它叫做“马可·波罗架”。这种架子，由两匹骡子负载就可带足“一百例手术、五百套敷料和五百个配方”所需要的医疗用品。这种运输工具的用途，由白求恩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向贺龙作了技术上的说明；贺龙为此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六个月后，当白求恩在他的病床上写下他最后的遗嘱时，他规定贺龙将得到他的一部分遗物。

究竟是什么基本的因素使得贺龙与白求恩产生了如此和谐的工作关系呢？他们共同的政治信仰、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以及他们相似的个性特征呢！前两点所包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白求恩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叫马兰·司各特的朋友，对他的长辈以及他自己作了如下一些评述：

“你一定记得我父亲、是个传教士吧，而我就来自这样一个家族：狂暴、变化多样、充满着激情的信心和坏主意；就象在我家有过的那样，尽管他引向着自毁，但还是要执着地保持着对真理的幻想并有追求它的魄力！”

尽管这样评述一直被问及到其历史真实性，但它多少还被认为是白求恩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批评。正是从白求恩的生平以及他如上的一些评述，人们认为白求恩是一个“信心坚强，行动明确”的人。贺龙正是在这一点上与白求恩极其相似。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冬春之际，当何其芳、沙汀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伴随贺龙去河北中部时，贺龙对他家乡湖南桑植的人民，当然也暗指他自己，作了这样的评述：

“尽管桑植的土著人‘野蛮’和粗鲁，但他们有自己的优点：实实在在、好胜、有骨气。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什么东西也改变不了他们；但如果他信任你，他们将不会转变态度。封

官或金钱是把他们收买不到另一边去的。还有就是，他们相当勇敢——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就为跟随我干革命而献出了生命。”

如上所述，在贺龙与白求恩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自我观点的一致性。自从白求恩与贺龙在山西北部首次会见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尊重与信任，随着在河北中部一起工作的机会的到来而加强了。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白求恩在他离开河北中部到达河北西部山区不久，给设在纽约的中国救援会（一种倡导性的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写到：

“我必须感谢所有的同志们（特别是贺龙将军和刘将军）和各阶层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随时都在提供的良好的合作。”

贺龙对白求恩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什么文字记录。延安的党中央把贺龙将军派往任何一个战场，这意味着党的组织是强大的，其纪律也能得到良好的遵守。一九三九年五月，发生在贺龙和白求恩之间的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插曲，一定给喜欢从事“非正统”事业的白求恩加深了印象，即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白求恩曾提出八路军应为一位叫Sun小姐的人，去北平联合医大医院治疗，提供交通工具并护送。这个意见引起了争论。Sun小姐属于西北医护组的成员，不属于一二〇师的管理范围。于是，总参谋长周士第拒绝了白求恩的要求。这事传到了白求恩和贺龙都熟悉的一位首长那儿。贺龙表示同意给白求恩以这种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但这种帮助只能以私人的名义为Sun小姐提供，不能通过一二〇师官方来办。贺龙谈了其中的原因：第一，统一战线的政策不允许八路军的单位超越自己的管理权限；第二，不管发生任何意外，比如说被日军抓住，也不能因此而降低八路军的威信。出于管理权限和组织上的考虑，贺龙凭着耐心和周到的方法平息了白求恩的火气。后